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

牛军

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某些特征。这一研究的结果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貌，并将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起源。

(一)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中共与世界的联系不再是简单地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列中，向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宣战。因此中共在调整其国内政策的同时，也相应地调整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共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心点，是根据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这一事实，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这与苏联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反对日本侵略无疑是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中国当时毕竟是一个政治不统一的国家，中共是一个有武装力量和地区政权的不执政的党。它在判断外部力量时，除了要看它们的对日政策，必然还要了解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因为反对日本侵略，并不必然赞成中国内部的和平和统一；赞成中国和平和统一，也不意味着必然赞成按照中共的条件实现和平统一。恰恰是在这些重要问题

上，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的利益关系，往往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所以中共中央在提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同时，就提出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问题。^① 利用国际力量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并抑制其反共政策，则成为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

抗战爆发初期，中国一切抗日力量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阻止日本迅速灭亡全中国。为了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中共于8月25日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抗日外交主张，即“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②。中共中央公开呼吁，应同英美法苏订立各种条件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协定，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英美法等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尽管还在动摇，但是“一般是向反日的方向发展的”，加之苏联的一贯支持，中国人民只要坚持抗战，就一定会取得胜利。^③

中共中央在积极推行党的抗日外交主张的同时，利用逐步形成的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国际社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在十年内战期间，国际社会几乎完全不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真实情况。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安排英美等国的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到延安访问。中共领导人经常与来访的英美人士会谈，介绍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通过他们的报导扩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33页。

② 《解放》第一卷第十五期，1937年9月6日。

③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国 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战时期）上册；周恩来，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1937年12月31日，见1938年1月10日《战 时青年》；彭德怀， 《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1933年春， 《六大以来》（上）。

影响。长江局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增强了党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随着英美法苏对中日战争的态度逐步明朗和国共合作形成后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展开，中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并相应地提出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具体原则。1937年11月，上海和太原相继被日军攻陷。中国军民经历三个月的浴血奋战，远东国际关系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这一时期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和声明表明，英美实际上仍然视华盛顿体系为维护远东国际秩序的“杰出典范”，所以它们并不准备采取阻止日本侵略扩张的实际行动。苏联与中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团和志愿人员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这是对中国的巨大支持。但是，苏联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超出苏联外交战略的总构想，即依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来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如果其它国家不跟上苏联的步伐采取实际行动，苏联援华就只能以不直接卷入战争为限度。这种严峻的外部条件，必然要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发生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希望借一时的坚决抵抗，争取国际上积极干预解决中日问题。然而国际干预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这造成国民党政府中的妥协倾向抬头。而国民党在积极抵抗日本的同时，继续维持其一党统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未放弃对国民党的警惕。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积极抵抗后妥协倾向抬头，同国际形势中的消极因素有密切的关系^①。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中共中央在宣传中开始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原则和苏联援助的重要性，提出必须揭露那些用国际环境对中国不利来掩饰民族投降主义的人。中共领导人一再说明，中国抗战一直得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78页。

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英美虽然缺乏实际行动，但在反日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能否推动各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取决于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抗战，而且抗战的最后胜利主要还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进行斗争来争取。^①

在中共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总构想中，苏联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除了苏联是正在给予中国巨大援助的唯一国家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对国际政治分野的一贯看法。苏联加强对华援助，肯定会造成对中共有利的政治影响；反之，如果对苏联援华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其对华政策失望或误解，又会直接影响中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正是苏联积极援华的事实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中共在进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宣传苏联援华的一贯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将“苏联的存在”解释为决定抗战基本规律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它在抗战时期对外关系的一般特征。这一时期中共的对外关系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作为不执政的合法政党，同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发生关系，并通过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外宣传工作，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它又领导着独立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和军队，这使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一般外交关系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抗战进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中共一方面推动国民党政府更积极地开展对苏外交，同时又可以不通过国民党政府，从苏联得到物资援助，尽管数量有限。此外，它同联共还保持着国际共运内部的党际关系。苏联除了通过党的系统直接影响中共的国内外政策，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发号施令。在中共

①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11月12日；周恩来：《目前抗战的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1937年11月16日；《群众》第一卷第二期；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1937年11月，《解放》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442页。

与苏联之间不同层次的关系中，国际共运内部的党际关系起着支配的作用。因此在抗战初期双方各层次的关系不协调时，矛盾必然首先表现为国际共运中的策略分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在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亦提出要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为了保存和发展已经取得的阵地，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①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实际已经开始部署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展开“攻势的批评与斗争”，并准备提出“先改组国民党，然后得于改组政府和改造军队”。^②

中共中央的行动很快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注意。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一是要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一是要以援华的实际行动推行它的集体安全政策。这两方面的需要都决定了苏联对华外交的重心必须放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支持中共对国民党采取激烈的行动，不仅有可能刺激国民党放弃联苏，而且将影响苏联与英美的关系。所以苏联感到有必要要求中共中央执行坚决拥蒋抗战的政策。11月初，斯大林告诉即将回国的王明，中共应全力以赴地去坚定国民党长期抗战的决心。共产国际相应地作出与苏联一致的决定。^③

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共问题上的分歧，主观上是由于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双方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中共中央认为，保存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决定中国抗战前途的首要问题。党在执行抗战任务时，必须十分谨慎地应付国民党消灭异己的图谋。而苏联更为关注的是贯彻它的外交战略，所以它担心的是不要刺激国民党。由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84—385页。

② 1937年10月13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小开、刘晓等人的电报。

③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5页、436页。

于苏联试图利用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的政策与它的外交政策协调起来，结果增加了中共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复杂性。中共中央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国际共运中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存在这些分歧，它们当时毕竟有远远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影响中国政局方面双方需要互相配合，这是它们克服策略分歧的基础。但是，王明回到中国后，并没有为解决双方的分歧发挥积极作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基本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改善国共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显然没有产生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所预期的效果。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表明，在统一战线中不仅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斗争的性质甚至比这更为严重。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感到有必要批评王明的错误，并在1938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国共关系的现状。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本意不过是希望中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促使国民党坚持抗战。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后，他们担心中共有可能被削弱而变得无所作为。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通过决议，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表示肯定。^①由于共产国际明确表态，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分歧的时机成熟了。9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并获通过。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全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第一次比较系统具体地阐述了党在抗战时期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与进步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必然会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法西斯国家的扩张是“首先侵略中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

间国家和采取不同的战争形式”，以及“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围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东方问题被“暂时放在第二位”，这不仅使一些大国产生了绥靖政策，而且一时也不可能给中国“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党的方针应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由于国际上各种势力的政治性质不同，在争取外援时，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与人民的区别，不可忘记这些国家现时政策与将来的区别。总之“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共运中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影响下，中共党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混乱。毛泽东专门指出，党的口号就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打败日本“同时就是帮助了外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爱国行动“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运用”。^①

抗战爆发是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党在这一时期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在争取外援中要区别对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等重要原则，不论其积极意义还是其中包含的某些局限性，必然都会对制定对外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些原则。

(二)

正当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战争时，欧洲形势也在发生剧烈变动。英美对德国迅速扩张一味绥靖，企图将祸水东引，这不能不引起苏联的警惕。苏联在东西两线受到威胁、集体安全政策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立即据此向各国党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见《毛泽东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

重新解释了大战的性质和国际的新策略。这场世界大战被解释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外交政策已转向“同苏联建立和平的相互关系的道路”，英法是“继续要求扩大战争的有力拥护者”。各国党应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调整策略，“从下层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任务，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① 苏联外交战略的变动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大混乱，欧洲各国党由于执行这个新策略而失去了群众和同盟者，有些国家的党甚至陷于瘫痪。

中国共产党同样受到影响。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新策略。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全部的和完全的接受”。^② 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讲话，认为目前德国与英法等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各国党应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贩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英美法等国的共产党应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反对本国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③ 中共领导人还认为，由于发生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世界正处于革命与战争的时期，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与酝酿，这种形势更有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走向彻底的民族解放”，因此党反对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法阵线和与它们结盟。^④

必须指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虽然给中共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并未造成对欧洲共产党那样大的冲击。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接受这个新策略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苏联远东政策变化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373—374、378—381、335—396页。

② 中共中央给王明、博古、凯丰的电报，1939年9月11日。

③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年10月10日；彭德怀：《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与坚持华北抗战》，1939年10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

④ 周恩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与目前任务》，1940年3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尚不明显，其外交重点仍在援华制日。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对欧洲和东方有不同的原则规定，即在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现在还是完全可以采用的”。^① 所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虽然使中共中央错误估计战争性质和国际形势，却没有从根本上妨碍中共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抗战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一度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减轻，有可能加强援华。另一方面，英美的远东政策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易于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英国政府在欧洲绥靖德国的同时，也在远东对日绥靖。武汉广州失陷后，英国立即展开调停活动，促使国民党对日妥协，在这种气氛中，国民党内妥协倾向增长，并导致国民党领导层分裂。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在蒋介石谴责汪精卫时，国民党报刊却与英美舆论遥相呼应，宣传拥护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反共分裂活动。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要求中共接受国共合并成一大党的方案，企图达到取消中共的目的。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套反共措施。国民党的政策导致了国共关系不断恶化，终于酿成了1939年底的第一次国共危机。

中共中央在六中全会期间仍然认为，日本与英美在远东的矛盾仍在加深，英国对日妥协有困难。但武汉广州失守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改变了看法。“慕尼黑协定”公布后，中共中央很快将英法绥靖德国同远东形势及国共关系的恶化联系起来，认为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是由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促成的，其根源就在于“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② 6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投降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出现新的慕尼黑的可能”。^③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6期。

② 《中央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25日，《六大以来》（上）。

③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同上书。

中共领导人认为，出现对日投降危险的根源，是英美加于国民党的压力，这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更加积极了”，它们是日本“包围中国外部”的“战略同盟军”，所以目前党的重要任务是动员国内外的力量反对英美。^①实际上在苏德签约前，中共中央已经在国内展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斗争。在1939年底发生的第一次国共摩擦，苏联采取实际措施干预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共产国际公开谴责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反共分裂的政策，这也使中共从获得的实际利益中感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尽管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它对西方反法西斯国家在战争中的作用绝对化了，以至于将英美作为日本的“战略同盟军”加以抨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远东正在发生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美国远东政策中开始增加了援华制日的新因素；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重心已经明确转向美国。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说明，美国向日本施加压力已是解决中日问题的焦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定后，蒋介石断定美国早晚将向日本开战。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动使其对美国的依赖性和美国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成正比地增加。中共中央实际上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在公开宣传中有所说明，不过这些言论确实显得太微弱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充分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在没有正确判断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放弃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不提英美仍有援华抗日的可能性，毕竟是策略失误。这一失误的后果是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之际，削弱了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当国共危机发生时则多少起了助长“左”倾情绪的作用。

^①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宣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57年）。

(三)

1940年上半年国际关系的演变的确云谲波诡，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以来的估计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并不吻合。到1940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克服党内“左”倾情绪的同时，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6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策略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远东有不同于欧洲的某些特征。报告指出，由于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和日美矛盾的扩大，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大地减少了。报告尽管还认为存在中日苏联合反对英美法的可能性，但更倾向于日美冲突不可避免以及苏联将与美国接近，并据此提出在政策上不再强调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在继续抨击“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作出将“爆发革命”的预言的同时，也指出英美法的绥靖有可能被德意的劝和政策所代替，中国能够坚持抗战的有利因素包括“有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可以利用”。^①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结论说：目前是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批评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在宣传中未能把握住国际形势的特点，认为日本近卫内阁上台后，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尖锐，“美苏关系必好转”，“滇缅路又有开放的可能”，英美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没有了”。中共中央明确说明：“要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因此不要去鼓励美帝国主义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外交，孙

① 《新中华报》143号。

科派的亲苏联美政策是正确的”。^① 中共中央提出，“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据此调整对外政策，其意义很快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表现出来。

英美苏为了各自的利益，于1940年夏秋之际不约而同地加强援华，使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国际背景。然而当国共关系骤然恶化之初，中共中央并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特别是不曾料到中苏关系改善在国共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在何白皓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出：英美政策使国民党迅速转变，在积极活动加入英美集团的同时，利用日苏谈判实行反苏宣传，其目前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所以必须反对和阻止国民党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当时也认为，国民党依赖英美反对苏联是定了，目前反共是作试探和准备工作，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所以应将英美拉蒋与德意日拉蒋一样看待，两者都会造成反共。

11月初，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对时局的看法，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前此的认识，认为英美抵制日本对中国抗战“是具有一定益处的”，并特别强调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的问题。^② 他在6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强调，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党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方针是“坚持独立战争和自立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利用外援”。^③ 毛泽

① 《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党宣传方针》，1940年8月2日。

② 1940年11月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61页。

东的论述是中共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同日，中共中央专门指示对英美记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以便通过他们形成党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工作。南方局通过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皖南事变公诸于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并最终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美驻华大使告诉蒋介石：“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相互残杀”。罗斯福带信给蒋介石，表示希望国共“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加紧其团结”。^①美蒋特殊关系此时正在形成，美国的态度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这是迫使国民党当局暂停反共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在皖南事变以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中共造成的影响主要是理论思想方面的，那么经过这次事变，它们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则清楚地暴露出来了。中共领导人显然也已经注意到，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并不是那样大，真正能够有时也愿意约束国民党的是英美政府。3月间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不必强调反对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集团，英美援华可以使国民党难于投降和难于反共，党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在总结克服此次国共危机时，不同以往地肯定了英美舆论和英美政府所起的作用，而对苏联的评价与过去相比显然是低调的。

经过1940年夏到1941年春的一系列事件，中共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此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开始了发生实质性转变的过程。

(四)

从1940年夏季开始的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在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全貌和战争性质等方面，中共仍然受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第一册，524页。

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严重影响。在如何认识随后发生的《日苏中立条约》和日美谈判等重大事件中，这种影响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这表明中共调整对外政策，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仅仅是一个开端。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多少潜心思考的时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了以往的错误，重新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各国党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于23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声明支持苏联反对德国侵略的斗争。中共中央的决定固然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图，但同它们有重要的区别。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变化始终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主轴，苏德战争爆发使以苏联为中心的倾向更加严重，它们强调各国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一切行动支援苏联，保卫苏联，却很少考虑各国党的特殊情况。对于以苏联为中心决定各国党的任务的原则，中共中央在实践中是无法接受的。中共中央在《决定》中已经表明了将根据党的具体情况和利益采取行动的意向，明确规定党的首要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此援助苏联。中共中央坚持的原则使它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再度发生矛盾。

此时中共对英美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面对苏联与英美的迅速接近，中共中央很快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①此后中共在公开声明中，对英美等不再使用诸如帝国主义一类的措辞，而称之为“友邦”，承认现在是“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②7月12日，英苏两国缔结共同对德作战协定。两天后中共中央即在党内通报中予以肯定，认为协定是“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

① 1941年7月6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② 《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

为了解决以往外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机关等，设调研机构，收集国内外各方面情报。中央直属调研局中专设国际研究组。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等20余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世界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即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对英美的政策是展开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真诚的反日反德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①第二天，中共发表公开宣言，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英美抵抗日本则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应与英美等“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②中共中央在党内指出，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各解放区应“放手大胆”地与英美方面进行情报与军事合作。^③

从中共中央的宣言和指示中可以看出党的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强调与英美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几乎没提到苏联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维持与日本相安无事的局面，既不愿意也没有余力干预远东事务。它先后撤走了在中国作战的飞机和大部分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并停止了对中国的军援。苏联的政策使它在抗战和中国内部两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明显下降，中共显然不能再将其作为自己外交工作的重心了。与苏联在中国影响力下降形成对照的是，英美的地位迅速提高，其中美国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具有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利益和亚太地

① 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的电报。

②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见1941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见1941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

区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使中共的外交工作必然要以美国为重心。实际上这时党的国际统战工作也是以对美外交为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南方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共中央重提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中共完成了一次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特点是党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彻底摆脱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桎梏，在现象上表现为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发生质变，与英美等关系迅速发展。

(五)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英美苏关系的改善，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外政策，而且直接影响着它对国内问题的估计。194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都认为，英美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失败使它们更依赖国民党政府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两面政策还会继续，1942年将是“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因此必须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压力和进攻。^①4月中旬，南方局报告中央，国民党正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随即发布指示，命令各地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反共行动。

从6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看法明显发生变化，其原因就是美英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改善。这期间周恩来来电告毛泽东，说明美苏关系不断好转，国际形势对苏有利，国民党目前不敢投降和发动反共内战。^②美苏关系的变化显然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苏美团结的很好，影响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需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形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

① 1942年1月20日、2月17日和24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

② 1942年6月10日、1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

可能变为现实。”^①8月14日，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在西安约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关系根本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②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成行，但他仍然认为目前是解决国共悬案的时机，只要苏军守住斯大林格勒，日本不攻苏，“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③

对于国际局势将对中国内部问题产生何种影响，蒋介石的估计与毛泽东截然相反。1942年12月，苏驻华大使返任时向蒋转交了斯大林的一封信，表示有意改善中苏关系。1943年1月，中美签订平等新约。4月初，宋子文向蒋报告了美国有意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美苏两国的态度使蒋介石断定，不论他对国内问题采取何种政策，最终都不会受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是他于1943年3月发表《中国之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共两党围绕该书展开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而且双方的斗争很快从政治思想领域的争论发展为现实政治中的冲突，致使1943年夏季国共关系又陷入危机。这次国共危机发生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中，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国共关系对远东政治形势的影响，引起了美苏的强烈反应。首先是苏联在对远东问题保持了两年的沉默后，开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政策。紧接着美国政府也采取措施，防止国民党政府扩大冲突。迫于国际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改变策略。在9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作出“政治解决”国共问题的承诺。

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之后，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美国的动向，重视发展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关系，对美政策迅速具体化。

①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

② 1942年9月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③ 1942年9月8日和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1944年春,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大溃败。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由于新疆的纠纷急剧恶化。这两个事件导致美国开始直接介入国共斗争。从6月美国总统访华到8月美国大使游说蒋介石,其目的都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和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问题,以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①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的同时,美国亦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7月22日,受美国政府派遣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驻华美军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也在许多地区与中共军队建立起联系。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变动必然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5月至8月国共谈判陷入僵局后,中共中央大幅度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变谋求问题的局部解决为通盘解决。9月15日林伯渠在三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组织联合政府。^②随后中共各报刊以组织联合政府为核心,展开全面的宣传。中共于此时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了世界民主潮流形成的一般条件外,美国以压蒋实行民主改革和联共的方式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构成了中共中央调整策略的特殊的国际条件。中共中央在考虑提出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已经在全面估价美国的政策。

当国共谈判在7月陷入僵局时,毛泽东认为:“国共关系之转变,要待蒋更困难和美给予更大压力。”^③因此中共中央非常关注美国的动向,并试图对其施加影响。中共中央获得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在重庆的南方局和谈判代表、有美军人员活动的各根据地,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不尽相同,但在美军急于利用中共军队配合对日作战方面,几乎是一致的。这些情报使中共中央断定,美军将在中国沿海发动登陆作战,并希望得到中共军队的配合。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124—125、131—133页。

② 1944年9月22日《解放日报》。

③ 1944年7月19日毛泽东给李先念、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西北局的电报。

8月18日，中共中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在党内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高度评价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并详细规定了对外政策和外事工作的原则，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意学习外交工作。该指示无疑是中共战时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标志，它表明党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内容正在从对外宣传工作转变为半独立的外交工作。这一转变导致了各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向同盟国敞开了大门。指示规定：允许盟军人员和武装力量进入根据地执行抗日任务，欢迎盟国派遣外交使团和在根据地设外交机构，欢迎国际投资和技术合作，希望与盟国新闻机构合作，允许外国教士到根据地从事宗教活动。指示专门说明，国内统战政策一般也适用于国际统一战线，但是盟国中的所谓“顽固保守分子”与国内顽固派不同，并不反共，对他们“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①

根据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更积极的对美政策，其中心内容是建立和加强军事合作，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造成全面合作的关系。中共领导人在党内指示中说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②这期间，中共中央调动有关部队和大批干部向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发展，加强沿海的游击战争，准备于美军登陆时在沿海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还要求各有关部队增设联络工作，改进参谋和情报工作，为与美军合作创造条件。③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重庆不久，中共中央便提出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方面提出军援问题。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等争取会见赫尔利、纳尔逊和史迪威，直接提出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一半供给中共，并邀请他们访问延安。中共领导人当时估计，赫尔利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② 1944年9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电报。

③ 同上，及194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华中局的电报。

任务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但在10月间赫尔利开始插手国共斗争后，毛泽东根据他的谈话断定，在一定条件下美方有可能作出有利中共的让步。^① 11月7日，赫尔利访问延安，中共领导人直接与美国官方代表谈判解决国共问题从此开始。

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经过两天的认真谈判，由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以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5点协议上签了字。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同时亦表示如蒋介石同意5点协议，他愿到重庆会见蒋，直接商谈解决国共问题，组成联合政府后中共仍承认蒋作领袖。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使赫尔利相信，5点协议是可以接受的。^②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中共领导人当时估计，赫尔利在协议上签字并不等于他的立场有根本性变化，而是他没有意识到联合政府和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这两者间的根本区别。蒋有可能接受后者，必定否定前者。果然当蒋坚决拒绝5点协议时，赫尔利便倒向国民党一边，转而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3点反建议，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中共中央这时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目前如加入未彻底改组的国民党政府，反而对蒋有利。而美方的妥协意在扶蒋，并非真正准备与中共合作。因此在12月7日的会议上决定，中断谈判，并准备早日公布5点协议。第二天周恩来致电赫尔利，说明中断谈判的理由，并告将公布5点协议。^③ 同日毛泽东会见美方代表，指责赫尔利言而无信。^④

毛泽东的谈话和周恩来给赫尔利的信使赫尔利和其它一些美方人士认为，中共中央已经下决心彻底决裂。赫尔利认为，单方面

① 毛泽东在董必武、林伯渠10月17日电报上的批语。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中国卷，693、699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143—144页。

④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91—99页。

决定公布5点协议是背信行为，其他一些人则担心，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他们一直认为这种决定“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① 中共中央的本意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同时，影响美国的政策，而非与美方决裂。所以当了解到美方的反应后，毛泽东立即指示王若飞转告美方，中共毫无与美方彻底决裂之意，5点协议可暂不发表，美方不应要求中共放弃原则，派几个人到重庆作官，其它一切都好商量。^② 中共中央同时召开会议，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1945年1月，经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恢复。这时日军在中国的攻势作战已停止，正面战场相对稳定，而美苏协调远东政策已到关键时刻，美国更急于廓清中国局势，为与苏联协调政策创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更为关心的是统一中国军队。这一变化固然给中共造成了新的困难，但对国民党同样形成了新的压力。由于美方急于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它仍有可能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中共中央对此采取的策略是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在政治上作形式的让步，同时拒绝讨论军事问题。

中共中央坚持的原则使赫尔利认识到，不压蒋在政治上让步，就不可能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他不得不一再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影响，促使其在政治问题上作出妥协。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于2月2日表示，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很快便否定了这项建议案。这使中共中央断定，逼蒋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尚未成熟。在国际方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毕竟还没有直接行动；美国的扶蒋政策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仍有变化的可能。中共中央遂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中断谈判，对美国亦持相同态度，“要攻掉美政府之扶

^① “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的报告附件”，1945年4月1日，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② 1944年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给王若飞的电报。

蒋主张”。^① 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将返回延安。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实际破裂。

(六)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共一度采取积极的对美政策，主要是基于对远东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的估计，而非根本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政治分野的基本看法。中共中央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力量的最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

当时欧洲的局势使中共中央有理由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将产生的影响寄予希望。1944年德军在盟军打击下迅速溃败。东南欧的局势发展清楚表明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后果。凡属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坚决支持对苏友好的政府；凡属英美势力范围的地区，情况正相反。欧洲形势的变化显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中共报刊对波兰和希腊发生的事件作了截然不同的评论。一方面热烈赞扬苏军在波兰的义举，另一方面则强烈谴责英军在希腊镇压希共领导的起义。中共报刊还提出要警惕和反对斯科比式的人物在中国策动反共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也反映在军队的战略部署中，其表现就是开始将战略重心逐步从沿海转移到北方。中共中央这时已看到美国一时不会放弃扶蒋政策，因此对配合美军作战开始持谨慎的态度。

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中共高度评价了苏联这一行动。^② 18日毛泽东即批转《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苏联对日作战已为期不远，今后配合盟国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发展方向是察哈尔北部和东北；为配合这一战略性变动，必须教育干部克服对美国的盲目观点，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③ 毛泽东批转

^① 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25日毛泽东给王若飞的电报。

^② 1945年4月7、8日《解放日报》，1945年4月8日《新华日报》。

^③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这份文件无疑是中共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在此前后，中共各报报导或转载苏联舆论的对华评论和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文章，均明显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开始对赫尔利的言行及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公开批评。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再次调整对外政策的转折点。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和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且“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至于英美则须注意中国人民的呼声，否则就会犯下绝大的错误。^①他在内部报告中告诫全党，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战后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党的高级干部要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大会期间中共中央还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美军在敌后根据地的活动，拒绝其修建机场和建立通讯网、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及侦察电台，目的是警惕美军的反共阴谋，增加其在敌后得不到中共军队配合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它在国内斗争中的策略。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3月1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说中公开声称，将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②，他还要求赫尔利转告美国政府给予支持^③。蒋演说发表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即载文予以尖锐抨击。周恩来致函王世杰指出，蒋决定召开国大使国内团结已无转圜余地。^④毛泽东告诉谢伟思，由于国民党提出召开国大，中共中央已决定筹备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⑤七大正式讨论了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成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公开对外宣布，中共将“尽可能迅速在延安召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86页。

② 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讲》，1945年3月1日。

③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十四册10页。

④ 1945年3月7日周恩来给王世杰的电报。

⑤ 《党史资料通迅》，1983年20—21期，20页。

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① 七大结束后，各解放区立即开始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对抗国民党召集国大的最激烈的措施。

中共中央作出这种强硬决定与它对美苏政策的估计有密切的关系。它认为，苏联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组成联合政府；美国为了促使苏联对日作战，不希望国共关系破裂，力图维持双方合作的局面，其对华政策并非没有变化的可能。^②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一面着手准备配合苏军对日作战，一面开展宣传战，毛泽东亦亲自撰文，抨击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特点是逐步放弃了一度奉行的积极的对美政策，将外交重心转移到联合苏联，利用配合苏军作战，创造解决国内问题的有利的外部条件，借以制约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由于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中共中央这时判断美苏在华关系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基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的认识。影响中共中央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苏联在东欧坚决支持对苏友好的政府、苏联对华舆论发表的观点、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程度和对打败日本的进程的基本估计等等。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共中央正确地估计到，苏联将是战后在中国制约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苏联以大国外交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对外政策可能给中国局势造成消极影响，缺乏足够的估计。特别是中共已经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组织联合政府，美苏在何种基础上协调它们的对华政策，其对国共关系产生的影响未必对中共有利。

从2月到8月，经过美苏谈判和莫斯科中苏谈判，在远东终于形成了以美中苏为中心，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格局。美苏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它们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

① 1945年5月4日《解放日报》。

② 1945年2月3日、1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6月17日中共中央给王若飞的电报。

位，并同意用吸收中共代表参加这个政府作为解决国共问题的方法。这无疑是对中共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方案的否定。美苏协调对华政策的内容尚不为世人所知，但其消极影响很快就发生了，主要表现就是国民党在外患未泯之时，便加紧了反共军事行动。7月间胡宗南部向中共关中分区爷台山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它的直接和公开的反应是立即加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批评，指出中国发生内战是美国扶蒋反共的必然结果。这时的中共对美政策是利用各种因素来防止美国的政策恶性发展到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援助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

随着形势的演变，中共中央这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从苏联得到直接援助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8月3日，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对正在进行的中苏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十分谨慎的估计。他说明中苏谈判的结果可能是订约，而且条约必定要同时照顾美苏双方的利益，不会是一个苏联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约，对此不可心存侥悻。能否应付复杂的局势最终取决于党自身的力量。但是苏联不会越过两个界线，一是它不会允许打败日本后，中国成为一个美国支持下的法西斯国家；二是斯大林是马列主义者，不会同国民党订立限制中国革命的条件。王若飞的报告显然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苏军对日作战的意义，但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外部援助时亦尖锐指出，国民党有美国援助，中共至今未得到外援，波茨坦会议公开发表的那一套，什么外国人来援助我们，没有写上。毛泽东评价苏军对日作战的积极意义显然是有明确范围的，苏联被当作一个制衡力量，在战时可以帮助打败日本，战后可以限制美国的影响力。至于它是否会给中共援助，毛泽东未作任何预言，他特别强调的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中外反动派。对于国际间有可能限制中共的协议，党的态度是“无法无天”，只向人民负责。毛泽东此时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很

快就显示出来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美苏对华政策的种种分析还是不充分的，但坚持自力更生和以我为主、靠自己的实力取得国际地位的原则，为中共奠定了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争取主动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